

简论永历政权初期的社会基础

何 平

1644年清军入关，以满族贵族为首的清朝统治者定鼎北京，面临“明兵在南，流寇在西”^①的形势。“明兵”（明朝残余武装）和“流寇”（明末农民起义军余部）是清朝南下统一战争中的两支劲敌。明朝残余武装方面，明朝的官僚和地主阶级分子（所谓“遗臣遗老”）不甘心于甲申年春君歿国亡的失败，企图延统绪于一线，在南方先后建立弘光、隆武、永历等几个小朝廷。弘光政权主要是以农民军为敌手建立起来的。隆武、永历政权则是在清军南下构成致命的生存威胁背景下建立起来的。这种差别是斗争形势变化的结果。自弘光政权败亡以后，由于生存这个共同问题，以及清朝政策失误，继起的南明小朝廷及其旗号下的明朝残余武装和明末农民军余部被历史无情地划入了同一条战线。永历政权是最后一个南明小朝廷，其活动的时期是清军对明取得最后胜利的时期，弄清永历政权旗号下南方的历史进程，对于理解清初历史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就永历政权初期的社会基础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求获得永历政权终至败亡诸因素的一个侧面。

永历政权初期的社会基础，包括明朝残余势力和明末农民军余部两大部分。明朝残余势力方面，由于所处地位、职守和发挥作用的不同，又存在着内部的区别。我们将分类加以论述。首先是拥立迎驾诸臣，这部分人在永历帝称尊及其播迁行止中起着关键作用，是永历旗号得以树立的中心武力支柱。他们充任拥立或迎驾首魁之时，势力煊赫，左右朝政。具体而言，丁魁楚、刘承胤、陈邦傅先后扮演过这一角色。

丁魁楚，字中翹，号光三，河南省永城县人^②。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崇祯九年（1636），在兵部右侍郎总督蓟、辽、保定军务任上，未能抗御清军，“失事于边”^③，被逮下狱遣戍边卫。两年后，纳饷援例得归，家居故乡永城。崇祯十五年（1642）十一月发生了永城总兵刘超叛明事件，丁魁楚偕同练国事协助凤阳总督马士英平息了叛乱^④。此后，他因功复出任河南湖广总督加兵部尚书。1644年弘光政权立于南京，任命丁魁楚总督河南湖广，兼巡抚承天、德安、襄阳。未及上任，便代沈犹龙改任两广总督，寻加兵部尚书衔。弘光亡，隆武立，仍以原官协理戎政。及至隆武二年（1646）秋隆武帝朱聿键被清军俘杀于福建汀州，瞿式耜倡议拥立桂王朱由榔，丁魁楚以“带甲五岭”^⑤的实力和基础与瞿式耜等扶植永历政权，成为朝中首辅。

永历政权建立时，清军已深入到福建、江西，北面清军也进至湖广，以西南一隅为立国基础的永历政权面临危急的形势，其存在和发展取决于“同仇恢复”抗御清军的程度。丁魁楚对永历政权使命的认识和拥立它的动机却不从这个前提出发。1646年秋隆武帝汀州遇难。

瞿式耜以“国不可一日无君”及时提出拥立“以贤以亲,宜正大位”的朱由榔^⑥。丁魁楚以隆武帝死无确信、无兵无饷相委蛇,又称广东地方官绅未至不敢定议。苏观生邀他拥立朱聿键,魁楚“虑其以旧相居己上”^⑦,拒绝了他。几经周折,才响应瞿式耜的倡议,1646年10月拥立桂王朱由榔监国于广东肇庆,次月称帝。因此,在拥立朱由榔时表现出消极的态度。由于他有“带甲五岭”的实力和基础,仍被永历帝任命为首辅,其节制的部队成了永历政权的中心支柱。

丁魁楚实际上并不具备以抗清为当务之急的政权首辅素质。弘光、隆武时期,他都任事两广。那时清军南征的步伐日益加快,江南各阶层民众群起搏斗,抗御清军。两广地处大陆最南,地理条件好,倘若很好地经营必定成为牢固的抗清后方基地。而他对地利的认识却不同,“怙安不修戎备”^⑧,婉如生活于完全不同于当时“天崩地解”的中国的别处天地。日以享乐为事,派水军至广东肇庆附近羚羊峡斧柯山下,放干河水,取砚石于老坑。行政用人方面,“将吏以贿为进退”^⑨,弊端丛生。及至任了永历政权的首辅,又与宦官王坤相结纳,私定黜陟,擅议朝政。在与同僚的关系上,也以权益为依归。大学士吕大器因与丁魁楚争掌兵权不得不辞而别,前大学士陈子壮听说由魁楚秉政,也不接受召命^⑩。缺乏威信和组织能力。

丁魁楚的用心花在身家性命和财货上。1646年冬永历政权和绍武政权发生军事冲突,瞿式耜倡议捐资助饷,丁魁楚吝而不予,置身事外。这年底,李成栋率清军攻占广州,他不主持抗战,随永历帝西遁。到了梧州,“竟不随扈”^⑪,别走岑溪。自从到肇庆后,他便日运财货至此为“狡窟”。这时他仍以私财为虑。李成栋的追兵赶至,他密派使者贿赂李成栋,雍发迎降。李成栋却在1647年春将他诱杀,并斩其家口数百人。

永历帝逃至桂林后,又在湖南军阀刘承胤的诱惑下到全州,永历元年(1647)春又被挟至武冈,成了刘承胤的傀儡。当时广州陈邦彦、张家玉的抗清活动牵制着李成栋的军队,永历帝略有驻足的机会,但危局并未消除。刘承胤迎驾永历,却旨在“挟上以制中外”^⑫。刘承胤主政,任人唯亲。他是一个粗暴专横的军阀,杖辱大臣,不以抗清为意。当时何腾蛟主持湖广抗清,刘承胤忌其权胜冀图倾抑,以伏兵相袭击。与张先壁等地方将领也因权利矛盾甚深,时生摩擦。军事上有内耗而无战绩。八月,清军逼近武冈,他劫帝降清不成便自率部众投降清军,后被清军处死于武昌。

永历帝从武冈颠沛流离,先至柳州,继至象州,依附陈邦傅。在对永历政权的态度上,陈邦傅也是唯利是图的人。他挟制永历帝,执朝权,擅进退。他“专南、太、柳、庆、浔、思、田七府土汉之地,每州县辄以部校率疲兵百余人据之,专置有司,征贡赋”,不支持友军的军饷,而且希求世守广西^⑬。他的专横引起了众多臣僚的不满,便煽动农民军李过、高一功部与异己将领相倾轧,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又造伪敕封孙可望为秦王借势攻击高一功、李成栋等。同时,在永历政权吴党与楚党的宗派倾轧中作为吴党的武力依靠,推波助澜。四年清军再陷广州、梧州、平乐,时驻肇庆的陈邦傅竟想去南宁“犯驾以降”^⑭。后来他杀抗清名将焦琏,投降清军。六年李定国光复桂林,处死了这个叛将。

丁魁楚、刘承胤、陈邦傅以首辅、扈驾元勋秉政,不致力于中兴和恢复,缺乏远大的政治目标,因循苟且。不能团结各种武装一致抗清,缺乏威信和组织能力。假永历皇帝以号令诸将,行其地方军阀自谋之实。结果都投降清军,成为叛臣。

二

第二类是作为前敌将领的战守诸将，他们面临清军进攻采取各种军事行动。其战守基地的伸长与收缩直接关系着永历政权的生存。何腾蛟、堵胤锡是这类人的典型代表，他们的言行表现出自己的特点。

主将不和。1645年何腾蛟到长沙主持抗清，总督湖广。同时，堵胤锡以湖北巡抚主持抗战。何堵两人是湖广战线抗清斗争的实际主持者。当时清军已深入长江沿线，日逼湖南。两人本该和衷共济，同赴国难。但两人时生齟齬，步调不一。1646年春，何、堵计划北伐抗清，何部取岳州，堵部攻荆州。结果何腾蛟部在岳州城下闻风而溃，堵胤锡部在荆州力战，失去犄角之助，终至溃事。永历二年（1648）年“常德事变”更是主将不和的典型表现。这年初金声桓、李成栋反正归明，湖南大部乘势得以恢复，马进忠麻河大捷后，堵胤锡以去年“长沙先陷，过在腾蛟”^⑮，催马进忠复长沙，称“督师失之，我为复之，不亦善乎！”^⑯借此羞辱何腾蛟。结果马进忠不从，堵在未与何腾蛟商妥的情况下，匆忙调忠贞营至常德。马进忠担心忠贞营吞并自己，而堵的属员郑古爱又从中离间，唆使道：“将军本督师何腾蛟所进者也，今与忠贞营并力攻长，事成则胤锡受其功，不成则移祸将军，何利焉！”^⑰马进忠竟“驱百姓出城，纵火不遗一椽”^⑱，大掠而走。

领导不力。两湖方面所驻军队众多，各部非常复杂。有农民军余部、左良玉部将所率官军、滇军，如何组织领导是摆在主持者面前的首要问题。明官军各部将不听约束，马进忠在湘乡“令诸军索粮屨于民，曰使百姓戴堵公恩，遂大掠湘乡间”^⑲。张先壁部“餉饩绝，掠野而食者两年”^⑳。黄朝宣在湖南“札牌四出，募兵官目几数千人，菜佣灶仆皆收为兵，殆将十万，田野为空”^㉑。盲目扩军，纪律败坏，“民稍触其怒者，即磔削之。”^㉒面对这些地方军阀，何腾蛟只能委曲求全，刻意苛索百姓以供养他们。何腾蛟“诚有余而才不足，拊循有余而军旅非其长”^㉓，无力节制这些骄兵悍将。永历三年（1649）清军大犯湖广，何腾蛟死，堵胤锡在退却途中，于龙虎关遭到明将曹志建的袭击，甚而发出“久临行阵，内外无援”^㉔的哀叹。

信心不足。1644年六月堵胤锡在寄给儿子的家信中说，“世界至此，国破家亡，吾再有何言？鞠躬尽瘁，危疆待命，急则身受于刳，暇则梁悬一索，苟无愧为祖宗父母之身，斯已矣”^㉕。对形势的认识是悲观的，对行动的选择是消极的，这种无愧而死的悲观意识无疑影响着抗清行动。1645年底何腾蛟在出师布告中也说：“兵家五字：战、守、死、走、降，战守不成，走降非策，则惟有一死”^㉖。全节固然可敬，却不能改变危局。

何腾蛟，堵胤锡等前敌主将，相互间步调不一，不能统驭各支武装力量扭成一股强大的抗清势力。组织领导不力，致使危局难以改观。在他们的抗清意识上，又存在着信心危机。结果，永历政权里的前敌武装在“同仇恢复”使命中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三

为史家所褒扬的抗清能臣瞿式耜、严起恒等是永历政权中的第三类。他们是为抗清办实

事的人，有切实的谋划和始终如一的行动，洵然朝中干臣。他们的行止和得失直接而典型地反映着永历政权的状况。

用心实事。弘光元年（1645）闰六月，瞿式耜至广西任巡抚，踏上西南抗清的道路。上任伊始就致力于整饬地方，为维护抗清领导权的相对稳定主持平息了靖江王朱亨嘉谋立事件。隆武二年（1646）秋隆武帝福建汀州罹难，鉴于“国不可一日无君”，他首倡拥立桂王朱由榔，终于在这年十月建立起永历政权。作为吏部长官，东阁大学士，实心挂事。其时苏观生等在广州拥立朱聿键建绍武政权，与永历争立进而发生军事冲突，瞿式耜捐款助饷，并亲率军队御敌。这年末，李成栋清军占广州，挥军西进。瞿式耜面对大敌主张积极抗战，提出调水陆军至三水扼止清军，得不到永历帝的支持，又请求留守肇庆，不成。他只好随永历帝至梧州又至桂林，永历帝“左右惟式耜一人”^{②4}，朝中大臣或逃或降。针对永历帝闻警而遁的逃跑主义路线他提出要坚持长期的抗清斗争，必须建立“中兴根本之区”^{②5}作为抗清基地。他认为当时的形势是“我进一步，人亦进步；我退一步，人亦速来一日”^{②6}。他认为桂林人文地理群众基础都有优势，“粤西山水险峻，寡可制众，弱可御强”，有“安恬之人情”；“桂民……乡各立团，民自为兵，一朝闻警，制挺而出，可以代王师，可以奏敌气”^{②7}。从而确立了以桂林为中心建立抗清基地的思想。自此，瞿式耜始终以桂林为立足点开展各项抗清工作，直至1650年与城同亡。然而永历帝仍到处奔逃，不听从瞿式耜的意见。面对这种情形，他内心十分痛楚，“每皇上移蹕一番，则臣心如擣，臣颜如削”^{②8}。在桂林，瞿式耜组织各支部队击退了永历元年（1647）三月、五月和次年三月清军的三次进攻。为了抗清大局，他能忍辱负重，二年二月郝永忠桂林哗变，大肆劫掠，瞿式耜家被洗劫一空，被迫避居樟木港，三月初才返回桂林公署，召何腾蛟、焦琏等至桂稳定了局势。在抗清斗争中，“骨力愈矫，胆气愈雄”^{②9}，历经靖变、虏（清）变、兵变、贼变（农民军哗变），心力耗尽，作“不讨便宜，不避危险之人”^{③0}。洵然抗清能臣。严起恒也是一个富谋略精实事的人。何腾蛟驻节长沙总督军事大权，军队庞杂，筹饷成了严重问题。他征义饷、增加赋税、开饷例、查抄富室筹饷，弄得人民怨声载道。严起恒遂鼓铸铜钱，几月就得数百万缗。除了输给何腾蛟作军饷，余额还用来修衡州永州城防，建上公熊黑两关卡，并拨出经费开闢试士，湖湘文化氛围蔚然一新。他颇有德望，郝永忠、卢鼎、黄朝宣、张先壁、曹志建等悍将都敬畏他，愿受其约束。

不尽其才。瞿式耜、严起恒都是素质很高致力抗清的人，永历政治的弊端却限制了才能的发挥。瞿式耜深明事体，直言进谏，但他的意见多不被永历帝接受进而形成正确的行动方针。永历帝受内臣王坤、庞天寿，佞臣马吉翔的影响，政治十分腐败，瞿式耜多次提出整顿朝纲，却不见于用。在一些重要关头，瞿式耜提出的重要主张被弃置一旁，终致债事。1648年初，由于自身利益得不到清廷满足，李成栋、金声桓在广东江西反正归明。这是一支重要力量，因势利导，抗清大局必然改观。瞿式耜提出“今日江广反正，则宜驻桂以图楚”^{③1}，乘势积极抗清。永历帝不从，却和一帮人到广东肇庆去庆贺。结果在获得些微的进展后，李成栋、金声桓相继败亡，一次挽回危局的大好良机便贻误了。无法于永历腐败政治加以更张，只能以“求吾尽吾心、吾尽吾职”^{③2}聊以自慰了。严起恒则陷入党争的纠葛之中。江广反正后，永历朝中“上下尸素，而各自为党，严起恒、朱天麟、王化澄、堵胤锡、吴贞毓等从患难蔑降臣为一党；洪天擢、袁彭年……于归附凌朝士为一党；吴憬、刘湘客……皆自诸路赴行

在为一党；陈世杰、杨邦瀚……皆广州人官本州为一党”^⑤。以地方区域、私人关系结成小圈子，相互倾轧，身为首辅的严起恒精力就用于这种内耗之中，甚至后来在孙可望封王事件中因此丧命。

信心不牢。这些抗清能臣行动背后的思想驱力却表现出复杂性。瞿式耜在明末罢过官入过狱，对明朝灭亡的必然性有切身的了解。弘光立，任命他为广西巡抚，他曾上《力辞广西巡抚疏》，对恢复失去信心。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才接受了任命。永历政权完全承袭明季“在廷则门户纷争，疆场则将骄卒惰”的腐败政治，他在家书中痛陈“今以一隅疆土，又当空匮拙乏之时，及欲行恢复中原之事，虽真有才智之士，亦将束手”，而“其见在朝廷者，干济则平常，争官则犀利，部曹则想科道，科道则想督抚，毕智尽能，朝营暮度，无非为一身功名之计，其意盖谓世界不过此一刻，一刻错过便不可复得矣！彼其胸中，何尝想世界尚有清宁之日，中原尚有恢复之期也哉！”发出“自崇祯而后，成甚期廷？成何天下？”^⑥的哀叹，实在很灰心。他为何要知其不可而为之呢？我们知道，早年他曾受业于东林党魁钱谦益，受东林言行影响，踏上仕途又以改革自命。东林党人以君子 and 清流自居，标榜名节。黄宗羲说过，“熹宗之时，龟鼎将移，其以血肉撑拒，没虞渊而取坠日者，东林也”。“数十年来，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义之盛度越前代，犹是东林之流风余韵也。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⑦。瞿式耜自然以忠义为行为准则了。严起恒也是这样。他们陷入南明必然败亡的认识和知其不可而而为做忠臣的矛盾中，影响了抗清实践。

四

大顺农民军余部是永历政权初期社会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1645年5月李自成在通山九宫山牺牲后，农民军鉴于清兵日逼，部队经连年战斗又遭严重损失，决意改变战略，加之清廷行剃发令，激化了民族矛盾，导致联明抗清。同年夏秋间，先后进入湖南。至九月，郝摇旗等率众至湘阴、浏阳一线，向何腾蛟靠拢。经过一度的摩擦和农民军主动合作行动，实现了联合。半个多月后，李过、高一功拥众数十万，于松滋草坪也与巡抚堵胤锡联合，被编为“忠贞营”。湖南军势因此大震，农民军成为抗清阵营的中坚力量。这年冬，在农民军官兵的英勇奋战下，取得了抗清战争的湘阴、藤溪大捷。顺治三年（1646）正月，李过、高一功等部大举围攻荆州，被清廷所派勒克德浑部击败，退入鄂西山区。顺治五年（1648年），堵胤锡联络忠贞营自巴东秭归出兵，七月收复夷陵（今宜昌），然后南下攻克湖南常德、益阳。十一月上旬连克湘潭、湘阴、衡山，兵锋直抵长沙，雄冠诸军。当时清军据守长沙兵力不多，本可乘胜收复湖南全省。由于南明文官武将矛盾重重，何腾蛟错误估计形势，将忠贞营调援江西，从而为清军反攻湖南提供了机会。郝摇旗一支也在抗清斗争中英勇奋战。1647年十一月，清耿仲明、佟养和部进攻全州，郝摇旗会同卢鼎、焦琏、赵印选、胡一青驰援，大败清军于全州城下，毙敌千余，被永历朝廷誉为“中兴战功第一”。农民军显示了坚强的抗清意志，然而由于永历当局和前敌主持人的阶级偏见和狭隘意识，他们的抗清行动受到极大的制约。

何腾蛟作为湖广战线的军事统帅，将大顺军余部一部分安置在湖北，一部分安置在湖南，分散了农民军实力，他自己只节制先来“投靠”的郝摇旗王进才部。即使对这部分人也

深怀疑忌。与他共事的总督章旷公然宣称“向谓用北人不如用南人，某谓用外镇不如用亲兵，与其以有用之金钱，养望敌还奔之响马，不如养站得脚跟之南兵；与其以有限之金钱，养进止自如之外镇，不如养可予夺遣发唯命之亲兵；且有亲兵则可以自强，自强则可以弹压响马，驾驭外镇，此壮威制胜之术也”^③。这种深怀阶级偏见和私心自重的分裂主义思想却赢得何腾蛟的共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联合初就借口缺乏粮饷，将大批农民军遣散归农，并派南明军官任农民军“监军”。还纠集黄朝宣、张先壁、刘承胤，“各益召募，以众相尚”^④使其与马进忠、曹志建等分散在大顺军各部周围，组成“十三大镇”进行监视和牵制。农民军卷入南明官僚内部矛盾的纠葛中（“常德事变”就是一例），削弱了抗清力量。永历当局和南明官僚在筹饷上也对农民军以不公正待遇，1648年就发生了郝永忠桂林哗变，而南明官僚又诬为“贼乱”。农民军面对永历当局和南明官僚的歧视和排挤，在失望中决定率部远离永历朝廷，前往川东鄂西地区另创局面。顺治八年（1651），忠贞营在李来亨的率领下抵达夔东地区，同刘体纯、郝摇旗、袁宗第等部继续坚持抗清斗争，直至康熙三年（1664）。

大顺军余部这支重要的抗清力量，战斗性强、作战经验丰富，本可在抗清斗争中起到柱石的作用，却由于永历政权的阶级偏见被排挤歧视，限制了抗清作用的发挥。农民军和南明官军名义上实现了联合，实际上双方只是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相互摩擦而已，并未形成一致抗清的牢固同盟。历史事实表明，这种联合是极为松散而消极的。这样，永历政权这支在抗清中可能发挥重要作用的强大支柱就被它的错误政策荒废了。农民军尽管独自地坚持抗清，也受主客观方面局限的制约，终至失败。

五

综上所述，第一，永历政权初期的各支武装力量，没有形成一股合力，不能团结一致抗清。他们的力量或受到限制，或相互抵消，在内耗中消失，在当务之急的抗清斗争中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第二，就个人素质而言，各支武装的将领及朝中重臣有优有劣。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的素质和他们获得影响政局的机会成反比。丁魁楚、刘承胤、陈邦傅政治素质极差，均以降清告终，却能把持朝政；瞿式耜等，公忠耿直，戮力抗清，却不能影响政局，左右永历帝的行止。政权中的这种反常现象造成政治腐败。第三，在抗清意识上，除丁魁楚、刘承胤、陈邦傅之流因循苟且终于投降外，何腾蛟、堵胤锡思想消极，瞿式耜、严起恒力主抗清，内心却充溢悲观情绪。信心危机通过不同形式在文臣武将中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尽管大多能以死表示忠诚，但这只是一种精神自慰而已，丝毫不能以此化作积极抗清挽回局势的物质力量。

最后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永历帝朱由榔缺乏政治素质是动摇政权社会基础的根本原因。朱由榔庸懦无能，苟且偷生，唯身家是顾，不日奔逃，沦为地方军阀刘承胤、陈邦傅的傀儡，政治腐败。这样，在“当残破之极”^⑤的严峻形势下，缺乏凌驾于各支抗清力量的有效权威进行统一领导。各种武装形成一种无组织力量，不能为实现抗清的共同目标提供组织基础。永历政权败亡的蹇运就不可免了。

①《清史稿》卷239《罗绣锦传》。

- ②光绪《永城县志》卷十九(人物)。按：王夫之《永历实录·丁魁楚传》称“字光三”。
- ③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72。
- ④《豫变纪略》卷6。并见《平寇志》卷5，光绪《永城县志》卷37、《明史》卷267《王汉传》。
- ⑤⑪《岭表纪年》卷一。
- ⑥李天根《燭火录》卷十六。
- ⑦徐薰《小腆纪传》卷六十三。
- ⑧⑨王夫之《永历实录》卷三。
- ⑩钱秉铨《所知录》卷二永历纪年上。
- ⑫⑬⑭王夫之《永历实录》卷26《叛臣列传》。
- ⑮⑯《永历实录》卷七。
- ⑰⑱蒙正发《三湘从事录》。
- ⑲⑳《邑志忠义传》，《堵文忠公集·附录》。
- ㉑徐薰《小腆纪年附考》卷十五。
- ㉒《永历实录》卷九。
- ㉓㉔㉕《永历实录》卷十。
- ㉖㉗《明季南略》卷十三、十四。
- ㉘张岱《石匱书后集》卷四七。
- ㉙㉚㉛《小腆纪传》卷28《瞿式耜传》。
- ㉜《瞿忠宣公诗文集》卷九《寄吴尔宁书》。
- ㉝㉞㉟《瞿式耜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卷一《请移蹕桂林疏》、《省会无虞再赴行在疏》、《请驻全阳疏》。
- ㊱㊲㊳㊴《瞿式耜集》卷三《戊子九月书寄》、《己丑六月初二日再付昌文》、《丁亥正月初十再书寄》。
- ㊵倪在田《续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四“永历党祸”。
- ㊶《明儒学案》卷58《东林学案》。

(上接第33页)

系，本文还没有对这些相关的问题作出回答。

- ① 《列宁全集》，第28卷，第168～169页。
-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8页。
- ③ 《庚子记事》，第15～16页。
- ④ 《义和团》第2册，第146页。
- ⑤ 《庚子事变文学集》，下册，第946页。
- ⑥ 《义和团》，第1册，第114页。
- ⑦ 《义和团》，第1册，第271页。
- ⑧ 李侃：《中国近代史散论》，第52页。
- ⑨ 《李忠节公奏议》，卷10，第4～10页。